

基于推拉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定居研究

郑永兰, 翟鸿健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 基于推拉理论重点研究中小城市逐渐成为定居主流趋势的内在原因。研究表明:在定居地选择中,稀缺的资源、“大城市病”、高昂的生活成本、“排外情绪”构成了大城市的“推力”,渐趋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多的就业机会、符合预期的市民化成本、与农村较方便的对接功能构成了中小城市的“拉力”,在两种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中小城市定居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首选。但社会资本难以延续、政策的不完善、社会支持网络的不完备和自身综合竞争力的欠缺成了现阶段中小城市定居的“阻力”,需要从中小城市自身发展、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教育培训、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着手进行解决。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推拉理论; 中小城市定居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34-274-04

Study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y Settlement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Push-pull Theory

ZHENG Yong-lan, ZHAI Hong-ji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Abstract Based on the push-pull theory,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causes of the small and medium cities gradually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of the settlement. In settlement selection, scarce resources, "big city disease", the high cost of living, "xenophobia" constitute the "thrust" of big cities, gradual improvement of infrastructure,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line with the expected costs of the public, and convenient docking with the countryside constitute the "pull"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under the action of two forces, small and medium cities settle into the first choice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owever, at the present stage, social capital is difficult to continue, the policy is not perfect, social support network is not complete and the lack of their own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constitute the "resistance" of settlement, ne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two yua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 and so on.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Push-pull theory;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y settlement

从国内外的实践与理论来看,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市民化依次递进的过程。在完全市场化的语境下,农民通过地域转移便实现了市民化身份的转变,但中国存在着户籍制度和土地非私有制度两个独特的政策变量,导致农村劳动力多数需经由“农民——农民工——市民”的过程来完成市民化。

“任何一个迁移潮流都会伴随一相反方向的反迁移潮流”^[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工便开始出现顺逆两个方向并行的迁移现象,在农民工进城的大浪潮中,也同时并存着返乡的涓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形成高度的城市认同感,多数不愿再回到农村继续务农。在大城市日趋饱和的容纳度和因过度集聚产生的一系列负面问题面前,结合城市落户门槛以及自身实际情况,中小城市成了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定居的现实选择^[2]。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明确提出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这也为中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基于中小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主体地位,笔者立足“推拉理论”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定居的动因,分析现阶段存在的障碍,并从多元主体角度给出对策建议。

1 概念与理论阐释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在城市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人口。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的背景下,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逐渐成为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员于2001年率先关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引起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广泛关注。2010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政府层面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让其实现市民化。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多数缺乏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有着较高的职业期望和物质享受要求,工作耐挫力却较低,不愿再回到农村,渴望融入城市生活。

在国家对中小城市户籍逐步放开的形势下,农民工就近就业、定居已成形势。中小城市具有先天的“亲和性”和后天的发展优势,近年大多农民工已显示出定居中小城市的意愿^[3]。费喜敏等^[4]利用河南省外出打工农民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以及东部发达地区并不是农民工主要选择的居住地,而地级市、县城和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中部地区可能是河南农民工主要青睐的定居地。季莉娅等^[5]基于103份调查问卷数据来研究广州市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定居意愿发现,广州新生代农民工在未来定居意愿上具有多元化的选择,“留城”定居是大部分青年务工人群的首选。在定居城市选择中,不少青年务工者选择从广州转向周边二线城市定居发展,回流到家乡所在的中小城市定居将成为他们实现“乡—城”迁移的重要途径之一^[5]。积极引导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落户,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有利于促进进城务工人员实现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以及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换的“三维立体转换”^[6]。

我国人口流动中主要存在着中西部向东部、农村向城镇这两股主流趋势,如何透过群体行为探究其中的内在机理?

基金项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中国梦”实现路径研究(13ZZB008)。

作者简介 郑永兰(1973-),女,江苏兴化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政治学、政府管理。

收稿日期 2015-11-04

推拉理论在人口流动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涵盖了劳动力迁移理论的主要方面。该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拉文斯坦提出的“迁移法则”基本框架。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赫伯尔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推拉理论概念,他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一部分为推力,另一部分为拉力。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迁移者个体的行为决策过程来看,推力——拉力理论的成立包含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假设人们的迁移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二是认为迁移者对原驻地和迁入地的信息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人口流动是促使人口流动和阻碍人口流动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在定居城市决策中,面对不同类型城市的推拉力量及中间存在的阻力,新生代农民工结合自身特性进行理性选择。因此,推拉理论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有着较好的研究契合点,可以在该框架下进行机理探析。

2 推拉理论下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定居的机理探析

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抱着挣钱养家糊口的目的,新生代农民工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城市工作,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划,也早已习惯城市的生活。他们早已形成强烈的城市认同感,不愿回落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而是选择定居城市实现市民化。在有意愿定居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他们面临着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定居的选择(图 1)。目前大城市倾向于限制性的农民工吸纳政策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较低,而中小城市的综合性优势使其能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宜居之地。在进城务工决策中同时存在着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正是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农民实现了在城市从事非农就业的地域和职业的转变。当然,无论是流入地还是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力^[7]。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在定居城市选择中,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存在着“推动”和“拉力”。

在宏观政策的引导和微观个体的理性决策下,定居中小城市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安居”“乐业”的明智之选。笔者基于“推拉理论”的框架,从大城市的推力和中小城市的拉力及现实阻力来探析其中的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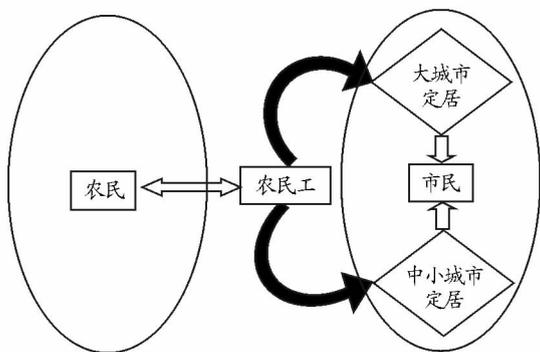


图 1 农民工城市定居流向

2.1 推力:大城市发展受阻,新生代农民工选择逃离

2.1.1 大城市资源稀缺,制约生活满意度提升。大城市多

半依靠一定的资源优势发展而来,在物质型和机会型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断流入的外来人口导致城市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不断下降,造成了“粥少僧多”的局面。随着城市人口的集聚,居民生活满意度也呈倒“U”形曲线走势,在达到城市适度人口之前,城市的繁荣发展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很大程度得力于外来人口的注入,但外来人口的继续流入会突破城市人口容纳的警戒值,同时也伴随着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下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变化有着很敏锐的察觉。城市生活满意度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决策,大城市奋斗的优越感在残酷的生活压力面前荡然无存,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纷纷选择“逃离大城市”。

2.1.2 大城市承载力较难提升,过度集聚暴露问题。如果将城市比作一个容器,那么城市的承载力由载体的容积和承载对象共同决定。大城市综合承载力提升空间有限,但承载需求却居高不下,并呈现加速上升态势。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十二五”规划中继续提出要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对不同的城市化地区进行优化开发或重点开发。足由此可见,城市承载能力是制约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城市化发展的总趋势是集中化、大型化,大城市人口密度的急剧增加,导致在狭小的市区范围内人口畸形集中,致使大城市生态条件不断恶化,“大城市病”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短板。相较于中小城市巨大的发展空间,新生代农民工对受阻于诸多瓶颈问题的大城市的发展预期大打折扣。

2.1.3 大城市定居成本高,超出新生代农民工承受范围。收入水平、价格水平和人力资本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是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各产业聚集效应的特点密不可分的,就而言,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8]。大城市高昂的消费水平和购房成本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有着很大关系,“资产泡沫”成分被严重夸大,经济的基本面直接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成本的提高。在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低廉的劳动报酬无法支付高昂的生活成本,作为理性经济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流式”市民化^[9]。

2.1.4 大城市政策歧视,新生代农民工较难融入。中外城市发展史表明,大城市有着难以取代的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另外大城市的单位城市化贡献率对国家城市化水平提高远高于中小城市的单位贡献率,正是基于这样的优势无形助长了大城市原住居民的“傲慢与偏见”。在社会歧视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政策歧视更助推了这种风气。大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准入、从事行业、劳动工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受限于诸多歧视性政策,城市中普遍存在着“二元用工现象”和“双重劳动力市场”问题^[10]。处于城市边缘地位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一系列歧视待遇下逐渐沦为“无机会群体”,城市归属感和融入感在一次次差别性对待中递减殆尽。

2.2 拉力:中小城市频释利好,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落户

2.2.1 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基本满足生活需要。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和居民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支撑作用。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记录,1978~2011年,我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年均增长25.2%,由12亿元增加到1.39万亿元,明显高于同期社会投资和GDP增长速度。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的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上,加强中小城市、县城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在宏观政策倾向性扶持的总体框架下,各中小城市立足自身实际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为出发点,以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立政府投资为主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共同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虽不及大城市的繁华,但中小城市不断提升的硬件条件已基本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需求。在进城买房的大潮流下,只要家庭条件允许,父母都会倾其所有为子女在城市购房,帮助子女“脱农”,成为城里人。

2.2.2 中小城市发展潜力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明显呈现阶梯型特点,大城市既是经济活动的主要聚集地,也是传统产业的率先转出地^[11]。在中国分权体制下,随着地区经济结构差异的增大和企业跨地区投资的增多,大城市积极寻求与中小城市建立合作关系,以推动产业的跨地区转移。大城市的辐射作用随着半径的扩大迅速衰减,但中小城市可以很好的发挥中继站的作用。中小城市是可以适应我国现阶段二、三产业发展的温床,加快中小城市发展能够有效缓解大城市结构调整的压力并能更好更快地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发展的可持续性。

基于发展阶段的现实,中小城市要主动接纳大城市转移的制造业和加工业,并进行合理规划,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来吸纳新生代农民工。

2.2.3 中小城市落户成本较低,符合新生代农民工预期。2010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有意愿选择务工地购房的农民工中,能够承受的商品房单价平均为2 214元/m²,远低于大城市房价的平均水平^[12]。“居者有其所”,在城市买房定居是对市民化最直观的理解,大城市高昂的买房成本远远超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承受能力。基于市民化成本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大城市立足,中小城市才是他们既能离开农村而平等享受城市市民化待遇,又能承受城市生活成本的理想之地。

2.2.4 定居中小城市可兼得工农、城乡两利,便于社会网络关系的延续。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选择家乡所在的中小城市定居,这样在节假日还可以回老家帮助农业生产,做到工农兼顾,加快资本积累速度。另外,受传统的代际关系影响,定居中小城市更容易得到农村父母在生活上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无论是农产品的补给,还是子女的托管,都能缓解部分压力。我国传统社会中人员流动较少,封闭式的交往环境形成了人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氛围。基于人们基本的情感交往需要,中小城市与农村较近的地理距离使得新生代与“乡里

乡亲”保持联系成为了可能。

2.3 阻力:大城市拉力、中小城市推力和自身动力不足共同构成干扰因素

2.3.1 社会资本无法延续,面临断裂的风险。相较于职业生涯起始于中小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那些从大城市回流到中小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着职业发展路径中断的风险。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参照物理学中的“惯性”给出路径依赖的概念,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对工作的胜任的预期更多基于实际的工作经历,而未涉足的行业领域胜任预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回流定居就必然面临职业的重新选择和职业基础的重新构建,部分技术型职业的转换较能适应城市转换后职业的延续,但依赖于社会资源的职业在地域转变后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在大城市积累的人脉资源面临断裂的现实。

2.3.2 现行的退出机制和接纳政策存在弊病,尚需完善。在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进入城市定居的大趋势下,现行的宅基地退出和耕地流转机制明显滞后于现实需要。伴随着市场化和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在逐渐消失,城镇户籍背后的红利也在不断剥离,而农村户口却可以享受村集体经济分红、征地补偿、拆迁补偿等收益。随着惠农政策的不断升温,户口一旦“农转非”,将无法享受一系列的政策优惠。在政策趋导下,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土地”进城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奇怪现象,对农村政策红利的念想也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是他们与城市社会双向互动和接受的过程,面对渐趋主流的中小城市定居浪潮,城市接纳制度在许多方面还亟需提升。城市的政策与农民工日常城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由于制度安排而无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造成政治参与过程中的群体性失声。另外,城市就业政策也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上实现城市融入。歧视性的城市人才选用制度已造成新生代农民工“被边缘化”的主观感知,不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更加剧这一状况。

2.3.3 中小城市的社会支持网络不完备,人文关怀缺位。新生代农民工现有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来自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关系网,而来自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这三大主体的支持力量却极其薄弱,仅依靠同质性极高的熟人关系网并不能适应城市生存环境的要求。

社会心理的融入作为市民化关卡性的一环,只有在城市全方位的人文关怀下才能真正实现在内在精神层面上的城市认同感。农民工从熟人社会到城市生活,接触到有别于农村的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现阶段中小城市以经济发展为工作重心,尚未形成系统的文化服务体系,这也无形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

2.3.4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竞争力匮乏,经济基础较薄弱。城市融入是阶段递进的过程,一定的经济实力是立足城市的基础条件。而目前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有限时间内个

人积累的资本尚不足以支付城市生活的高昂成本。

新生代农民工怀揣对未来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来到城市就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站稳脚跟,但在激烈的工作竞争中自身竞争力不足已严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生涯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教育水平虽已得到很大提高,但尚未具备较为专业的职业素质和技能,导致他们无法胜任高端前沿行业,大部分就业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3 助推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定居的政策建议

3.1 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合理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定居 截至2012年底,中国有建制市657个,中小城市占比81%,总人口达10.18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5.2%,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6.8%,另外中小城市及其直接影响和辐射区域的城市化率仅为35.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相较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城镇化发展还明显滞后。现阶段中小城市应依托大城市辐射效应,通过产业承接来增加城市就业岗位,并不断完善城市相关政策为新生代农民工能在定居地更好的发展提供政策环境。另外,需结合自身特色来构建城市发展蓝图,挖掘城市内在潜力,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切实感受到城市发展对生活产生的改变,并坚定城市定居意念。

3.2 继续深化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消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 改革进入深水区,滞后于社会现实要求的城乡二元制度成了改革的拦路虎。地方政府应主动割断农民工进城的后顾之忧,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的退出补偿机制。再者,全面户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应是通过更加系统的顶层设计对与户籍相联系的福利体系、公共服务的全面改革,为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创造条件。

3.3 加强教育培训力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竞争力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追求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31.2%的人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56.2%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能够组织开展技能培训^[14]。基于中国逐步从“人口红利期”向“后人口红利期”转变的大背景,政府和用人单位应强化对人力资源重要性和职业培训必要性的认识。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推进培训机制创新,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职业培训体系。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立立体式全方位教育体系,不断提高农民工的道德意识、人文素养、科学文化水平,将其培养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3.4 完善社会支持网络,提升城市包容度,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中小城市应努力营造“身份无高低、职业无

贵贱”的良好社会氛围,消除行业歧视,尊重为城市发展付出辛苦劳动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存在的认知错位,还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双方平等对话交流,增进互信和了解,打破“心理隔离墙”。完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服务政策,让其平等享受市民化待遇。同时要鼓励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融入本地生活圈,引导他们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积极探索群体内部的互助互动机制。此外,还需要逐步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在住房上给予他们应有的城市生活尊严。

4 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突破城镇化发展瓶颈的重要一环。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在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做出中小城市定居的决策。成功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必将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吸引带动更多的“身边人”,掀起一股中小城市定居潮。在中小城市逐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首选定居地的大趋势下,各级政府部门应未雨绸缪,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需要,逐步消除制度壁垒,努力营造包容的人文环境,帮助落户移民塑造市民身份,促进新移民尽快实现城市融入。

参考文献

- [1] LEE E. S. A theory of migration[J]. Demography, 1966, 3(1): 47 - 57.
- [2] 孟习贞. 外来农民工落户经济强镇的困境与出路[J]. 中国统计, 2012(11): 19 - 20.
- [3] 韩雪, 张广胜. 预期就业风险、就业动机与进城务工人员就业选择行为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4(6): 79 - 90.
- [4] 费喜敏, 王成军. 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实证研究[J]. 软科学, 2014(3): 40 - 44.
- [5] 季莉娅, 王厚俊, 杨守玉, 等. 广州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定居意愿调查研究[J]. 南方农村, 2014(12): 16 - 22.
- [6] 辜胜阻, 郑超, 曹誉波.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推进均衡城镇化的战略思考[J]. 人口研究, 2014(4): 19 - 26.
- [7] 余华义, 唐翔. 中国36个大城市相对消费价格指数测算: 兼对国内宾大效应的实证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15(4): 22 - 35.
- [8] 潘华. “回流式”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机制及其逻辑[J]. 社会建设, 2014(2): 19 - 26, 35.
- [9] 杨本建, 王珺. 地方政府合作能否推动产业转移: 来自广东的经验[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193 - 208.
- [10] 马西恒. 城市社会的隐忧: 国有、集体企业的二元用工制度[J]. 社会, 1995(9): 14 - 16.
- [11] 农民工市民化, 卡在哪儿[J]. 决策, 2011(9): 22 - 24.
- [12] 李卫东.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0(3): 20 - 22.
- [13] 牛凤瑞, 白津夫, 杨中川. 中小城市绿皮书·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M].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2.
- [14]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课题组.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2(6): 5 - 22.

(上接第236页)

- [6] 林南.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3.
- [7] 包亚明.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布尔迪厄访谈录[M]. 包亚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89 - 211.
- [8] 汪天颖, 陆林. 路幸福. 徽州村落旅游中游客及东道主的凝视行为[J]. 旅游学刊, 2015(4): 23 - 32.
- [9] 张鑫. 资本与文化的现代性悖论[J]. 青海社会科学, 2015(1): 152 - 157.
- [10] 刘昌雪, 汪德根. 皖南古村落可持续旅游发展限制性因素探析[J]. 旅

- 游学刊, 2003(6): 100 - 105.
- [11] 迈克尔·波特. 态度, 价值观, 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济学[C]//赛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43 - 61.
- [12] 戴维·思罗斯比. 文化资本[C]//薛晓源, 曹荣湘. 全球化与文化资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547 - 562.
- [13] 玛丽亚·杨森·弗比克, 格达·K·普里斯特利, 安东尼奥·P·罗素. 旅游文化资源: 格局、过程与政策[M]. 孙业红, 闵庆文, 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1 - 17.